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王国敏 等 / 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农”协同发展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项目号: 15BKS038]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XINSANNONG” XIETONG FAZHAN YANJIU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三农”协同发展研究

王国敏 等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项目策划：蒋姗姗 舒 星
责任编辑：蒋姗姗
责任校对：刘 畅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研究 / 王国敏等著. —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4
ISBN 978-7-5690-4703-5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三农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85630 号

书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研究

著 者	王国敏 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4703-5
印前制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印 张	24.25
字 数	576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6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press.scu.edu.cn>



四川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内容摘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重大问题。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三农”工作，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无论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还是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各方面的集中展现和全面进步，形成了与世情、国情、党情和农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又希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和途径，为解决人类城乡融合发展和“三农”协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但又不容否认，在急速前行的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的浪潮中，随着我国城乡流动性增强以及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对乡村社会带来强烈的结构性、技术性和价值性冲击，农业和农村被现代化发展的阴影所遮蔽、解构、遗弃；乡村社会整体出现衰退和衰败，以及呈现出包括人口、土地、产业、基建、宅基地、基层组织在内的乡村地域空间整体空心化。因此，如何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叠加的“并联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城乡协调、产业协同以及“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协作，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过或正在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对于地处东亚“小农经济圈”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紧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城乡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文化结构、技术结构、空间结构和生态格局的转换，面对乡村地域农业经营主体结构变化、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村空间结构演化，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新趋势，党和国家明确了推动“三农”工作要从“新农村建设”升级到“乡村全面振兴”，从“城乡统筹”演化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的总体战略取向。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三农”工作重心也迎来了从“决胜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任务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政策话语的再现超越了传统“农村”政策话语的认识边界，超越了“只见物、不见人”的新农村建设模式，超越了传统工业化、城市化偏向战略思维，形成了新时代城市与乡村价值等值和功能互补的城乡关系新定位。为此，城乡融合时代以乡村振兴全面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

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业、新农民、新农村实现“产业—主体—空间”的协同发展、整体发展和全面发展，成为新时代“进入新发展阶段”党和国家领导和推动“三农”工作的决策共识。

因此，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业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和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强起来”时代的历史方位之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时代推动“三农”工作的总纲领、总遵循和总抓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潜力后劲在“三农”，根本抓手是“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协同发展的新内涵、新要求和新内容，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重视、领导和推动“三农”工作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基础上，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面向中华民族进入“强起来”新时代、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做出的关于“三农”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协同推动城镇化的乡村振兴。乡村全面振兴应与城镇化发展并行不悖，要在协同重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点论”基础上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点论”。

乡村是具有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特征的地域综合体，兼具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能，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荣，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性空间。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整合乡村地域综合体“主体—产业—空间”多维要素，坚持国家战略、地方实践、行为主体的宏观、中观与微观的统筹，是摒弃城乡融合时代线性式“都市化幻想”“城镇化想象”，以及建构承认城乡差异性、多样性及认同乡村价值性的题中之义。从传统“乡土中国”发展到“后乡土中国”或“城乡融合”时代，我

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乡村地域空间最为突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也集中体现在乡村，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较大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农业依然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同步发展中的短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薄弱环节。换句话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以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引领“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协同发展，就是要着力挖掘农村发展潜力，培育新型农业业态，优化乡村空间格局，完善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健全涉农政策体系，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美丽中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乡村社会基础。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部门，“农业现代化”“现代农业”的提法耳熟能详，而“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概念相对少见少提。推动城乡融合时代的乡村振兴，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协同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意味着党和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定位和要求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宏观叙事中，要超越“三农”发展的“问题域”逻辑，以“积极发展”话语将“三农”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研究，以更加全面、综合、整体的思维思考和解决“城乡中国”时代，或者说“后乡土中国”时代的“三农”问题。如果单纯地将农业、农村、农民孤立地，甚至是相互割裂地进行研究，以农业问题替代农村问题，以局部的、个体的农民问题替代总体性的乡村问题，都会在理论和政策导向上造成混乱。因此，从“清单式问题域”的批判性单向思维向“协同型发展论”的建构性整合框架的范式转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协同发展研究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学术进路。本书在寻求多学科对话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为主学科视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协同发展为旨归，尝试通过“旧三农”与“新三农”异质性比较、“新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理论建构、历史剖析、战略重构、机制完善、动力整合等内容展开，摆脱理论界在“三农”研究中的自说自话、政策界涉农政策相互冲突的现实困境，为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照。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协同发展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三农”协同发展的研究对象。“三农”“新”的内涵、特征、目标、趋向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农业发展方式与农民生活方式交互作用以及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三农”协同发展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权力、市场与社会有机整合的必然选择。二者共同构成本书的研究对象。

第二，“三农”协同发展的研究缘起和理论建构。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要求出发，阐述“三农”研究缘起。在纵向理论的演进上，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三农”协同发展思想为基点，梳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三农”协同发展思想；在横向理论的援引上，突出与西方诸多农业农村发展思想的对话。在理论溯源基础上，提出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研究要超越传统“产业结构转换”的经济视域局限，明确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已经形成了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全面振兴”、重构城乡空间新格局的决策共识，即基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和城乡“空间结构共生”整合视域出场的“新三农”协同发展研究。本书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乡融合时代以乡村振兴为战略引领的“三农”研究的“空间化”策略和取向。以乡村振兴引领“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理论框架建构，是本书的重要创新之处。

第三，“三农”协同发展的历程、经验和特色。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三农”发展历程，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一历史发展逻辑，就能把“三农”问题看得深、把得准。本书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历程划分为制度创新（1979—1984）、市场化导向（1985—2002）、统筹城乡发展（2003—2012）、从城乡一体化到城乡整合引领下的乡村振兴（2013至今）四个阶段，详细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四个阶段”主要是围绕生产责任制实行初期生产关系变革、非农产业兴起带来的政策调整、工业化进程中的“三农”新举措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农”发展战略转换等实践进程。进而，依据“历史进程”提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所形成的包括本质遵循、思想前提、根本要求、重要手段、基础保障“五条基本经验”，并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所彰显本源性与科学性、人民性与时代性、求实性与协调性、实践性与开放性“四大特色表征”。

第四，“新三农”协同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国际挑战。总体上看，“新三农”发展面临着来自三个层面的矛盾：一是农业、农村、农民各自内部的矛盾；二是农业、农村、农民之间的矛盾；三是农业、农村、农民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绿色化之间的矛盾。具体看，“新三农”协同发展存在“六大矛盾”：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不良的矛盾、“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村”建设的矛盾、农业增产与农民不增收的矛盾、农地规模化经营与农民利益保护的矛盾、精准扶贫的艰巨任务与现有扶贫体制的矛盾。“新三农”协同发展面临的这“六大矛盾”进一步强化了“三农”发展现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绿色化进程不同步和不协同的现象。当然，阻碍“新三农”协同发展有包括禀赋、历史、阶段、体制等多重归因。“新三农”协同发展面临的内部多重矛盾及其背后的多重归因，也进一步给“新三农”协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国际挑战，比如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带来的冲击、跨国农业垄断公司对我国农业产业链的渗透、农业“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严重不足等，这给新时代“三农”协同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国际风险。

第五，“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要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根本指针，关键在于把党的领导全面贯穿到“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体现“中国特色”的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贯穿“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构建新发展格

局、畅通城乡经济社会循环作为新发展阶段“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促进农业高效高质、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坚实的“三农”支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进程中，也要始终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和循序渐进作为基本原则，站在“新三农”协同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的政治高度，以满足亿万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三农”协同发展变革的切入点、把适度规模经营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同步推进作为“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着力点、把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三农”协同的关键点、把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向外延伸点。

第六，“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动力系统，是在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五化叠加”的“并联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着力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关键议题。这一动力系统，从根本上应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核心范畴具体展开。本书将这一动力系统解构为“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层动力和外延动力三个层面，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蕴涵和特色。动力机制是动力系统构成中的核心环节，是引导“新三农”协同发展的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主体、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与方式，本质上反映了“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是引导其相应制度设计和政策调适的基本依据。本书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蕴涵和特色，从构建党领导“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优化“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政府“牵引力”、激活“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市场“源动力”、塑造“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社会“驱动力”、重构“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等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以此实现了对“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核心动力、中层动力和外延动力等动力系统展开合理解构与建构。

第七，“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支撑体系。从功能作用上看，支撑体系内在地包含两个层面的要点：一是发挥引导性功能的根本路径；二是起着保障性功能的制度政策。“三农”不仅体现为由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发展问题”，而且更深层体现为由工业化、城市化引致的“空间问题”。从“发展”到“空间”的转向，跳出“三农”看“三农”，跳出“三农”促进乡村振兴，也就成为审视新时代“新三农”协同发展不可或缺的新视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预示着新时代超越“传统产业结构转换”的经济视域、以“空间”建构方式通过重塑城乡工农关系、推进城镇与乡村“空间生产”的整合来推进“新三农”协同发展，已达成决策共识。某种意义上，“新三农”协同发展已经进入重构城乡地域空间格局、畅通城乡经济社会循环的新阶段。与“引导性功能的根本路径”相适应、相衔接，党和国家也亟须通过制度调适和政策优化来为“新三农”协同发展提供保障性支撑。因此，本书基于这种理性和现实的双重逻辑判断，推动“新三农”协同发展就需要从“引导性”和“保障性”两个层面同时着力。在“引导性的根本路径”上，需要从工作视野上跳出

“三农”看“三农”，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根本途径；需要从行为主体上，实现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着力挖掘“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在潜力。在“保障性的制度政策”上，需要从把脉“三农”制度变迁逻辑，围绕政府与市场这一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激活农村各类资源要素活力；需要从细分“三农”政策层次上，围绕“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空间再造、产业融合、主体培育等关键环节，不断提升政策设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在“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的宏观历史方位的政治判断背景下，“新三农”协同发展也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引领和乡村全面振兴推进的“两翼齐飞”的新时代。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道路，是新时代“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让亿万农民生活更美好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构建适应“新三农”协同发展要求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三农”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乡村振兴有效制度供给和政策创新能力，汇聚全社会力量投身于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引领的“新三农”协同发展的事业中来；必须坚持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协同并进，统筹“新三农”协同发展面临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各层次，整合“新三农”协同发展涉及的主体、产业和空间各要素，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加快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三农”协同发展格局；必须坚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首要位置，不断完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增强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内生发展能力和可持续生计能力，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必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征途中，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引领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农业高效高质、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推动形成以“乡村振兴”支撑“民族复兴”、以“三农强国”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代化发展格局和新路。

目 录

引论 新发展格局下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引领“新三农”协同发展·····	(001)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理论建构·····	(046)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理论溯源·····	(046)
一、纵向理论的演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046)
二、横向理论的援引：与西方诸多思想资源的对话·····	(079)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框架建构·····	(085)
一、“三农”发展研究：传统“产业结构转换”经济视域的局限·····	(085)
二、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全面振兴”：重构城乡空间新格局的决策共识 ·····	(087)
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空间化”：城乡“空间结构共生”整合视域出场 ·····	(088)
四、以乡村振兴引领“新三农”协同发展：基于“空间结构共生”的理论框架 ·····	(093)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历程、经验与特色·····	(109)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历史进程·····	(109)
一、制度创新：生产责任制实行初期的生产关系变革（1979—1984）·····	(110)
二、市场化导向：非农产业兴起引发的政策调整（1985—2002）·····	(112)
三、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化背景下的“三农”新举措（2003—2012）·····	(118)
四、从城乡一体化到乡村振兴：“三农”发展的战略转换（2013年至今）·····	(126)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基本经验·····	(134)
一、坚持以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引领“三农”发展的本质遵循·····	(134)
二、坚持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作为厘清“三农”误区的思想前提·····	(136)
三、坚持以解放发展农村生产力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要求·····	(137)
四、坚持以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作为发展“三农”事业的重要手段·····	(138)
五、坚持以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作为突破“三农”困境的基础保障·····	(139)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特色表征·····	(141)
一、“三农”理论依据的本源性与科学性·····	(141)

二、“三农”价值取向的人民性与时代性	(142)
三、“三农”目标任务的求实性与协调性	(144)
四、“三农”具体内容的实践性与开放性	(146)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矛盾挑战	(148)
第一节 “新三农”协同发展面临的五大矛盾	(149)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	(149)
二、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不良的矛盾	(151)
三、“物的新农村”与“人的新农村”建设的矛盾	(155)
四、农业增产与农民不增收的矛盾	(158)
五、农地规模化经营与农民利益保护的矛盾	(160)
第二节 “三农”发展现状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不协同	(163)
一、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协同	(163)
二、农村发展状况与城镇化进程不协同	(166)
三、农民信息素养与信息化突飞猛进的步调不协同	(167)
第三节 阻碍“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原因分析	(169)
一、禀赋原因：农业要素禀赋缺乏比较优势	(169)
二、历史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仍有待破解	(172)
三、阶段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制约	(175)
四、体制原因：政府与市场定位不清	(179)
第四节 “新三农”协同发展面临的国际挑战	(181)
一、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我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冲击	(182)
二、跨国农业垄断公司对我国农业产业链的渗透	(187)
三、农业“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企业自生能力严重不足	(191)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战略选择	(194)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指导思想	(194)
一、“四个全面”战略：引领“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根本指针	(195)
二、“五大发展理念”：贯穿“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基本思路	(202)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	(211)
一、坚持党领导“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原则	(211)
二、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原则	(213)
三、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	(216)
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	(217)
五、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	(219)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主攻方向	(220)
一、变革的切入点：协同推进农业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220)
二、发展的着力点：同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	(222)
三、协同的关键点：加快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	(225)
四、向外的延伸点：重构新时代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228)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动力机制·····	(230)
第一节 构建党领导“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	(231)
一、加强党对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顶层设计是首要任务·····	(231)
二、完善党对新时代“三农”工作领导体制是根本保证·····	(232)
三、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建设是重要支撑·····	(233)
四、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机制是必然要求·····	(234)
五、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领导是底线任务·····	(235)
第二节 优化“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政府“牵引力”·····	(236)
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236)
二、新型工农城乡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241)
三、农业农村支撑制度体系改革·····	(244)
第三节 激活“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市场“源动力”·····	(248)
一、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改革·····	(248)
二、乡村空间生态利益补偿机制改革·····	(253)
三、农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56)
第四节 塑造“新三农”协同发展的社会“驱动力”·····	(261)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生发展能力培育·····	(261)
二、农村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转型·····	(266)
三、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方式的全新变革·····	(271)
第五节 重构“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外联动机制·····	(276)
一、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机制·····	(276)
二、公共服务的均衡供给机制·····	(281)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支撑体系·····	(284)
第一节 “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根本途径·····	(284)
一、跳出“三农”抓“三农”：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归途·····	(285)
二、从行政推动到内源发展：“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内部挖潜·····	(291)
三、“新三农”协同发展——进一步走向共识的行动逻辑·····	(294)
第二节 “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制度调适·····	(301)
一、制度构成与分类：诱致性制度抑或强制性制度·····	(301)
二、“三农”制度变迁的逻辑：政府的退出还是市场的嵌入·····	(304)
三、农村土地制度优化·····	(306)
四、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309)
五、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313)
第三节 “新三农”协同发展的政策保障·····	(317)
一、政策分类与实施原则·····	(317)
二、基于空间再造的政策体系·····	(318)
三、基于产业融合的政策体系·····	(324)
四、基于主体培育的政策体系·····	(332)

结语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三农”协同发展道路·····	(345)
一、政党、政治和政策逻辑：理解“新三农”协同发展的“一条主线”·····	(346)
二、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让亿万农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两个抓手” ·····	(348)
三、宏观、中观和微观：“新三农”协同发展方略原则的“三个层次”·····	(350)
四、主体、产业、空间和制度整合：“新三农”协同发展的“四条路向”···	(351)
阶段性成果·····	(354)
参考文献·····	(356)
后 记·····	(373)

引论 新发展格局下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引领 “新三农”协同发展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①

——习近平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就没有正确的行动实践。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指出：“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②同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③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不断开辟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④《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一书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依然在为当代政治和学术做出贡献，并且可能在进入21世纪后仍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思想的参照点。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发展中的传统。”^⑤换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⑥。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

①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23页。

②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第8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7页。

⑤ 达里尔·格雷泽、戴维·M·沃克尔著，王立胜译：《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292页。

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①。因此，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提出的时代要求。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基本问题，不仅事关国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也关系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绿色化的纵深发展质量。自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三位一体”整体范畴提出以来，“三农”问题便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②以及“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③等“三农”整体发展论断相继提出，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农民以新的时代蕴涵和价值功能。同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全面推进之后，乡村社会也在经历着市场转型的历史过程，城乡二元分割格局下的乡村，也开始面向并走向市场社会”^④，中国也从传统型的“乡土中国”时代进入了具有开放性特质的“城乡中国”和带有乡土性特质的“后乡土中国”并置的时代。由此所带来的中国乡村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三次产业结构融合、农业经营主体结构多元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方式、乡村基层治理方式的巨大变迁，既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也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亟须着力解决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在这种大背景下，以怎样的学科视野和研究视角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业、新农村和新农民问题，如何在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周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拓展农业多元价值功能、促进农民稳定持续增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时代乡村振兴引领“新三农”协同发展，便成为亟须科学和全面回答的重大课题。

一、国内外“三农”发展研究的学术史梳理：简要的回顾与评价

（一）国内研究回顾

1. 坚持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都针对“三农”发展问题提出过诸多有益见解。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⑤伴随着政治革命的演进，中国发展为纯粹的农业社会逐渐发展为新兴的工业社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

②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835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658页。

④ 陆益龙：《后乡土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页。

⑤ 李友梅、黄晓春、张虎祥等：《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1921—201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会，这种结构性变迁必然会对农民、农业和农村产生深刻的影响。^①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认识到土地之于农民、农民之于革命的重要性，先后提出了“耕地农有”^②、“在农民间作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③、“打土豪分田地”^④等主张，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曾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农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绝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⑤将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农业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三农”问题、推进“三农”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如毛泽东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⑥，明确了农业之于国民经济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⑦的思想，揭示了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及农业农村未来的发展趋向；江泽民提出“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我国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⑧，厘清了农村稳定、农民小康、农业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稳定和全面小康的逻辑关系；胡锦涛做出了“两个趋向”^⑨的判断，把21世纪“三农”发展推进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开始“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我国现代化道路独特性，即“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⑪，认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同步发展，就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始终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现

① 于建嵘：《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1912—1949）》（第一卷上册），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编辑说明”第1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③ 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二册补编（1919—192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17~21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27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⑧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9页。

⑨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7页。

⑩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⑪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9页。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①。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揭示了在“五化”同步发展进程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协同发展具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第一次明确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的角色定位、功能地位和目标趋向。

2. 国内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发展的论述及其政策实践，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等角度展开了对“三农”发展问题的深入系统研究。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很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呈现了“三农”发展研究的实践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特征。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提出以来，“三农”作为“三位一体”整体范畴便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21世纪以后，随着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急剧变迁带来的城乡各类资源要素非对称性流动、“空心化”趋势、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短缺、公共服务体系建立滞后等“三农”问题的日益暴露，学术界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呈现井喷状态，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2000年3月，时任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提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②的“三农”发展危机，此后，我国学术界开始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三农”发展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

一是关于“三农”发展的整体性与乡村全面振兴研究。陆学艺（2002、2005、2013）以社会学家的视野，从农业发展和粮食问题、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农业现代化道路、农民分化与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城乡统筹与社会建设等方面，全面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三农”问题的发展和演变，这集中体现于其关于“三农”研究的“三部曲”学术成果。^③贺雪峰（2003）以费孝通先生为学术楷模，追随费老先生《乡土中国》的文字风格，从乡土本色、村治格局、制度下乡、村庄秩序、乡村治理、乡村研究方法等层面建构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整体框架。^④武力、郑有贵（2003）认为，“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三农”问题不是孤立的，它关系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⑤徐勇等（2009）从现代化视角整体思考农村与农民问题，对城乡统筹的理论基础和发展目标、就业增收导向的增收模式、以精简机构为导向的乡镇改革、后税费改革时

①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2~23页。

②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③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陆学艺：《“三农”新论——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陆学艺：《“三农”续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

④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4~251页。

⑤ 武力、郑有贵：《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